

「體國經野」

——試述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

• 唐曉峰

地理學是我們古老的而今天又不能忘卻的一種思想方法。

—— D. Meinig

一 「理」地之學

中國古代無「規律」一詞，但有道、有法、有統，這些觀念在中國古代豐富的地理思想中大都存在，既用於自然也用於人文，表達的是一個共通一致的道理，其實就是「道統」。所謂地理的道統，就是一個和諧穩定、有等級秩序的「普天之下」。

地理這門學問在人類知識體系中起源甚早，其近代以來的變化也十分之大。地上的山川格局依舊，而古今地理學的論說體系卻各為一套，相差懸殊，原因在於古人、今人的思想方法各異，論說的內容也不盡為山川格局，還要有人文一端，即所謂人文地理。另外，無論是「自然」還是「人文」，古今談地理者所要達到的認識目標，更是不同。孔子說：「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今人在考察山川時，斷不會有孔子的想法，今天自然地理學家要的是「自然規律」。中國古代無「規律」一詞，但有道、有法、有統，這些觀念在中國古代豐富的地理思想中大都存在，既用於自然也用於人文，表達的是一個共通一致的道理，其實就是「道統」。所謂地理的道

統，就是一個和諧穩定、有等級秩序的「普天之下」。

在「普天之下」，事物繁複眾多，地理之學就是要將它們「理」出一個秩序來。翻開今天的地理教科書，從氣候帶開始，到地形單元、土壤水文、植被分布、城鎮體系、人口密度、交通網絡等等，對地上之物凡「重要者」統統按照一定次序歷數一遍，其間還要揭示「其所以然」的內在規律。這是今天地理學的思想體系與主要內容，其表述、論證的總目標是一個由「自然科學規律」與「社會科學規律」所支配的地球表面。

但翻開古代的地理書一看，雖然大致也有山川、土壤、澤藪、郡縣、人口等事項，但次序，即「理」地的方式，卻另是一樣。比如講山澤水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在屬性上「凡地

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①。如此一番講述，今天的地理學家定斥其為胡言亂語，但古人卻深以為是，所以代代翻刻，習誦者甚多。從學科史的角度講，古人的這一套地理，絕不是一堆胡亂的次序，其背後依托的是一座古代意識形態的構架，包含着古人頭腦中顛撲不破的「天經地義」，古代的地理講述，無不以此為準的。地理講述，反映人們的天下觀、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是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今大多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對此尚未有足夠的重視。

地理之學不是一門忠實記錄「客觀」世界的學問。在思想家那裏，它是人們天下觀、宇宙觀、自然觀、社會觀、宗教觀、人生觀的一份說明書，以似乎十分客觀公允的例證，說明一套可能並非公允的思想體系。在政治家那裏，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更是治國平天下的戰略、手段、目標，是主動出台的統治意志，是極盡道德宣教與武力征伐之能事而務求實現的社會空間秩序。在各時代的政治文本中，均有地理一章，故社會地理、政治地理向來是地理之學中極其重要的部分。現今歐美大學中，將地理劃歸社會科學門類，就是因為其十分強調地理學在說明與治理社會方面的功能。

在中國古代，人文發達，政治悠久，大地域王朝接踵統治「天下」。以其地域之大、區域種類之多、歷史之長，在這樣一部社會歷史中，沒有發達的社會地理之學是不可想像的。圍繞王朝的建立、鞏固、發展，勢必形成一套專門的地理學問體系，此可稱為王朝地理學。只是在不少系統考察

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著述中，不注意從歷史出發，而僅僅以今天的地理學框架，去格式古代地理學的內容，力圖寫出一部令今人順耳稱心（而古人很可能看不懂）的古代地理學史，這是削古代地理學之足，適今日地理學之履，寫出來的古代地理學已經面貌全非了。比如今天重自然地理，於是就把古代所有關於自然界的記錄匯在一起，分門別類，稱之為古代的自然地理學。對古人的這些零散的自然界知識，稱為「知識」則可，稱其為「學」則不可。學，要有專人、專書，師者講授，學者研習，前後傳承之，一脈貫通。古代並沒有多少如此研習自然地理現象的傳統。的確，明朝出了一個徐霞客，專門考察自然，撰有《徐霞客遊記》，但僅屬個別，故令當時人驚異，稱其為「奇人、奇書」，且後繼無人。只有王朝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流大宗。

本文欲對中國古代形成並長期發展的王朝地理之學作一扼要考察。不過，此乃古代的一大套學問，博大精深，本文僅為個人一孔之見，不可能周全，況且與古人、古書對話，誤解難免，謹待方家指正。

二 從「天人之際」到「人人之際」

王朝意識形態以儒家為主要代表，本文考察王朝地理，儒家思想是一個重要依據。追溯王朝地理的形成，我們從上古地理思想，或說被儒家化之前的地理思想開始。那時的地理思想是人神相混，世界觀不以人間的德行為上，不強調人間的文德教化，而以神的作用為主。甚至社會組

古代的地理講述，絕不是一堆胡亂的次序，其背後依托的是一座古代意識形態的構架。地理講述，反映人們的天下觀、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是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今大多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對此尚未有足夠的重視。古代並沒有多少研習自然地理現象的傳統，只有王朝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流大宗。

圍繞王朝的建立、鞏固、發展，勢必形成一套專門的地理學問體系，此可稱為王朝地理學。追溯王朝地理形成的初期，地理思想是人神相混，講的多是天人之際與山川的神性，據說最能通天的是崑崙之丘。登山弄神，設立祭壇，已是由來許久的做法。

織也可以神為中心而建立。章太炎說上古時代有一類神守之國，神守國不設兵衛，而名山大川卻所在多有，因為它們不與諸侯之好聘，故滅亡時不載於方策。神守之「國」，應該是極其古老的社會組織，其以禮神為社會的核心樞紐，而神又存乎天地之間，所以在神守之國，首領主要是禮名山大川，執行神職。因為名山大川都具有神性，居之便可以為神，所謂「人神雜糅」。這一時期的地理思想特點是，地，不是獨立的，而與天相勾聯，神靈貫穿於天地之間，地上的萬物都與天、神有關。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雖然人們的行為都是在地上，對地勢河流也利用得當，但一敞開思想，就跑到天上，純粹的「地」理幾乎不存在。

有許多這一時代的地理講述片段保留下來，後世也總有一些好神鬼之術的人樂談此道，講的多是天人之際與山川的神性，例如，《禮記·祭法》：「山林川穀丘陵能雲雨，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鬼神謂山川之神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在地上萬物之中，據說最能通天的是崑崙之丘，「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②。登山弄神，設立祭壇，已是由來許久的做法，五千年前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便發現有祭祀遺址，位於高山頂上，築有「女神廟」，其大小建築成一線排開，似為一條中軸線，這種空間布置，表現出很強的意識形態特點。山川以其偉大的形體，令人類景仰，即使到了現實主義意識形態很濃的王朝時代，也多少還有祭祀山川的事情保留下來，但僅僅是禮儀

形式，而遠離了日常地理事物的主流。

傳說至顓頊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③。甚麼是「絕地天通」？按《國語·楚語下》所記觀射父的解釋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絕地天通」預示着天地分、人神分，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條材料，另外由此產生的神轉巫，對社會組織也有深刻影響。學者們對「絕地天通」的問題多有討論，本文無力詳述。我們在這裏所關心的，只是由以反映出來的一條對地上現實世界漸漸作獨立觀察，並日益重視人類社會自身主題的思想走向。關於這一走向，歷代史家有不同表述，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史包括神話，而《春秋》則重「人人之際」。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孔子並不是先導，章太炎評述這件事時更推崇老子，他說：「管仲兼雜陰陽一派，有許多鬼話。老子出來，就大翻了，並不相信天地鬼神和占驗的話。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學說，所以不相信鬼。」④楊向奎先生持有同樣看法，他說「到神守的後人老子來否定這神守與上帝，而提出『道在帝先』。孔子更提出『人人之際』，來代替『天人之際』」⑤。到司馬遷撰《史記·大宛列傳》時，對如何描述西域，也採取了很現實主義的立場，他自稱：「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記·大宛列傳》關於西域的記載，是一篇沒有「鬼話」、「神話」的地理文獻，在記敘異域的早期地理文本中，有別於《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在中國地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發展，隨着大型複雜王朝社會的形成，「人人之際」日益成為現實

社會所層出的主題，從而也是王朝政治需要投入主要精力去處理的課題。「人人之際」一切在空間上的表現，都是地理內容，一般說就是一地之人與另一地之人的關係或曰人文區域之間的關係等等。一地之人與另一地之人的關係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信仰的等等。在大地域內建立穩定的王朝，必需解決好各地人群之間的協調關係，建立某種鞏固的王朝地理秩序，保證地雖偏遠仍能聽命於朝廷。關於這一套作為，在《周禮》中叫「體國經野」（詳見後文）。在一代代「體國經野」的理論與實踐中，逐漸積累形成了王朝時代經緯大地的典章制度和記錄考訂地理名物的學科，古代稱輿地之學。「方輿之書所記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蹟、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此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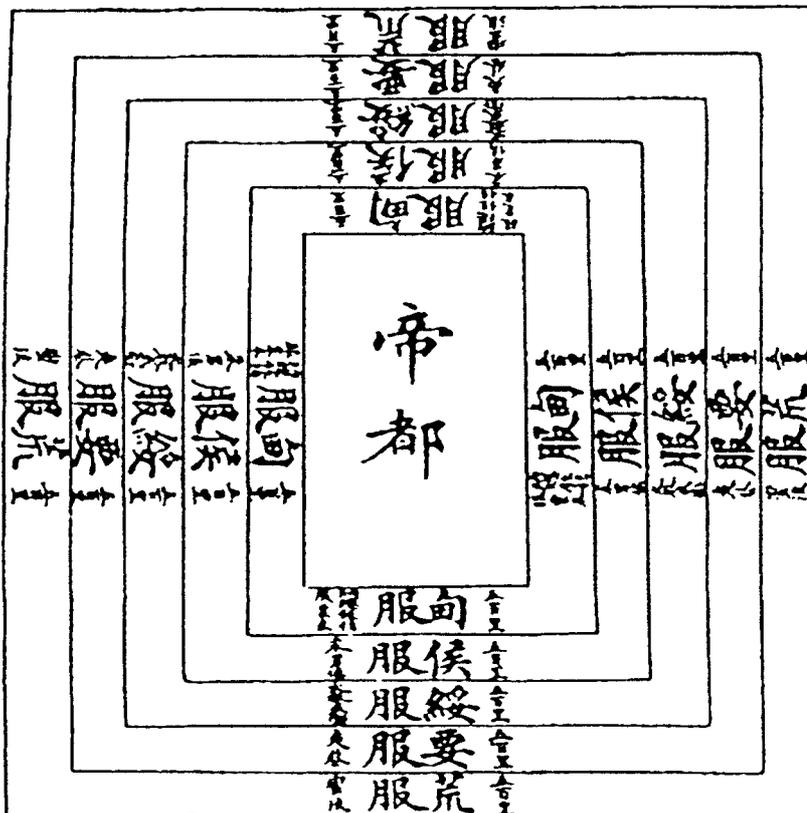
人事」^⑥。當然，古代地有神性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絕迹，其以各種形式仍一浪一浪泛出。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幹大宗，或說被儒家化的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鞏固王朝與建立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地理，強調人神分、等級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統、和諧無疆等等。

三 「九州」與「五服」

《尚書》是古代極重要的一部經典，記錄了距今二三千年前王室的誥命、誓言和其他大事，先秦士大夫著書立說多加以援引，自漢代立為官學以後，成為歷代帝王將相的政治課本，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工具。《尚書》中的《禹貢》篇，儘管只有1,193字，

在大地域內建立穩定的王朝，必需協調好各地人群之間的關係，建立某種鞏固的王朝地理秩序，保證地雖偏遠仍能聽命於朝廷。在《周禮》中把這一套稱作「體國經野」。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幹大宗，或說被儒家化的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鞏固王朝與建立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地理，強調人神分、等級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統、和諧無疆等等。

《禹貢》五服之圖



關於華夏世界畫作九州的說法不僅在《禹貢》中出現，在其他先秦文獻如《周禮·職方》、《呂氏春秋·有始覽》中也有，這反映了九州觀念在先秦社會上的普遍流行。九州與五服逐漸成為理解、規劃華夏世界的基本原則，是四海之內任爾是「諸侯」「霸王」均不可公然否認的至高無上的大秩序。

卻歷來被奉為王朝地理的經典之作，為「古今地理志之祖」，其中所談的重要地理觀念，為歷代言地理者尊奉，而在《禹貢》中所明確表述出來的最核心的地理觀念，當屬假大禹之口而頒行天下的「九州」與「五服」。

「禹別九州」，依次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這九個州，覆蓋了華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而每一個州都有對京師依等級的貢賦之責。所謂「五服」，指自京師向四面每五百里為一「服」區，由近及遠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由於水土平定和九州與五服的建立，於是「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這是一個有關中國人文世界在地理空間上塑造成形的重要歷史傳說，禹的大功在於從雜亂無章的洪荒世界裏，確立了一個文明的大秩序，正所謂「芒芒禹迹，畫為九州」⑦。這一文明地理大秩序的重要之點是等級性與向心性，要害是令「五千里內皆供王事」。這為後來一統王朝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雖然在《禹貢》成文的時候（先秦時期），九州與五服在現實中均不存在，但觀念先成的情況說明，當時中國社會之內已經存在着能夠被思想家與政治家察覺的一統動向，九州與五服絕不是幾個智者的沒有社會現實依據的突發奇想，而頗具當時社會思想層面的真實性。關於華夏世界畫作九州的說法不僅在《禹貢》中出現，在其他先秦文獻如《周禮·職方》、《呂氏春秋·有始覽》中也有九州之說，只不過九州的名字不盡相同。這一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於先秦社會。九州與五服逐漸成為理解、規劃華夏世界的基本原則，是四

海之內任爾是「諸侯」「霸王」均不可公然否認的至高無上的大秩序。「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國的完整。

清代學者胡渭歸納《禹貢》十二項地理要義：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稅斂之法、九州之貢、四海之貢、達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錫、武衛之奮、聲教之訖⑧。這十二要義簡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業的全部政、教、兵、財工作，所謂王朝地理的內容不過如此。在一統王朝尚未建立的時代，能出現這樣完備的關於大地域一統王朝的社會地理觀，出現關於王朝空間規制的如此具體的設想，是令人吃驚的。這正說明，當時社會走向一統化的歷史醞釀，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

唐朝的賈耽說：「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⑨，意思是《禹貢》是講「中國」地理的首篇，而記述「外夷」的地理書則要推《史記》與《漢書》為先。其實，《禹貢》雖然沒有對外夷作具體敘述，但對之進行了明確的定位，提出了人文地理上「華夷之限」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地理觀念。《禹貢》五服的概念表明，以京師為天下文明的核心，離開京師越遠，文明程度越低，五服中最遠的兩服即要服與荒服「乃在九州外矣」，就是說「要服」、「荒服」屬夷不屬夏。關於夷夏之限，是先秦時期在許多諸侯國已然流行的觀念，在《春秋》三傳中多有反映。

關於華夏地域還有另一種表達，即「禹迹」，九州出現在禹迹內，「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禹迹的觀念似乎很早就出現了，在講求華夷之限的觀念影響下，列國爭相宣言自己在「禹迹」之內的位置。據說商人、周人都尊奉

「禹之迹」，《詩·商頌·長髮》：「天命多鬪，設都於禹之績(迹)。」《詩·大雅·文王有聲》頌作邑於豐時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後世所做的全國地圖，也常名之為「禹貢圖」、「禹迹圖」、「華夷圖」。

無論是「禹迹」還是「九州」，都是王朝國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國家的統治者除了依據武力對組成新國家的各部分進行控制外，還需要創造一種關於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樹立國家法統觀念。「禹迹」、「九州」正是國家法統在地理觀念上的表述，具有神聖性、法統性。謝維揚在《中國早期國家》^⑩一書中清楚地指出了國家與法統地域的特殊關係：在國家建立後，由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漸成為標誌國家主體的不可分割的內容。這在中國歷史上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即建立一個真正的、被承認的國家，就必須佔據特定的地域，並有相應的中央權力。「九州」就是這樣的特定地域，中國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概念的顛撲不破，以至今它仍然為中國人所使用，表達國家領土的神聖性。

四 中央一統之國

中國古代很早便出現了大一統的思想，關於這一點，一些外國學者很難理解。然而大地域的一統感，畢竟是中國社會知識和社會實踐的基本特色。早在先秦時代，社會中便出現了「九州」、「五服」、「五嶽」、「四海」等宏大的天下觀念。傳說時代的上古帝王是華夏文明開基的代表人物，他們幾乎都有組建大地域社會的偉業。按《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順序，「人倫初祖」黃帝曾「撫萬民，度四方」，他的

活動範圍「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展示了一幅遼闊畫面。後面的「帝」，一個接一個，也是同樣。帝顓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堯「百姓昭明，合和萬國」。舜則像是實行了大地域一統政令措施的帝王，他巡狩天下，「同律度量衡」，變四方，令「天下咸服」。至禹，平水土，置九州，更是華夏文明在大地域上確立的神聖象徵。傳說雖不是信史，但其中表達的大地域一統觀念，則不容忽視。

圖中為禹乘應龍。應龍為傳說雙翼神龍以尾畫地，禹依其痕平水土。



「中國」的觀念在周武王時已經出現，指的是今嵩山洛水一帶，周公築雒邑，就是實現周武王的設想，建立一個「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居天下之中的城邑，也可以說是「中國」。就起源來說，「中國」的概念與都城的核心性有密切關聯。由於要具備核心性，中國古代都城就必須具有凌駕巨大空間範圍的權威力量，這是中國都城的政治地理本質。

古代王朝地理學的現實目標是構建中央一統的大地域王朝，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中央的絕對權威，二是施行全國的統一政令，兩者相輔而行。「中國」的觀念在周武王時已經出現，指的是今嵩山洛水一帶，周公築雒邑，就是實現周武王的設想，建立一個「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居天下之中的城邑，也可以說是「中國」。就起源來說，「中國」的概念與都城的核心性有密切關聯。「翼翼商邑，四方之極」，說的是商都，「四方之極」就是四方的中心，已經含有「中國」的意思。由於要具備核心性，中國古代都城就必須具有凌駕巨大空間範圍的權威力量，這是中國都城的政治地理本質。古代地理文獻上對於都城的描述，無不宣揚它的「拱極」地位，即使在自然地理位置上都城明明偏於一方，比如明清北京，但在人文理解上也照樣寫道：「蓋其神阜形勝，天府膏腴，扼四塞以居中，處上游而馭遠，鬱鐘王氣，龍盤鳳舞之祥，俯視侯封，棋布星羅之勢」，有「千百國朝宗之盛」^⑩。在都城的形狀格局上，也要突出皇帝的唯我獨尊，並構成象徵宇宙的形態，這些手段顯示了都城在禮法等級社會中的至高性、唯一性，是增強都城在遼闊地域、眾多人口之中的權威性、崇高性的有力措施。這一措施在明清北京城的平面設計上幾乎達到了盡美的程度。

在古代地理書籍的敘述體系中，都城毫無疑問是敘述的總出發點，居於王朝地理知識體系的核心，由「中國」而全國，而四夷，這也是「五服」的次序。另外，都城不但是政治的核心，也是社會道德的至高點，王朝道德當然以忠君為本，而忠君在大地域王朝，也有地理上的特殊表述，即我們很熟悉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一類。建立大一統的王朝，在觀念道德上求得一統，十分重要。在中國的「元典」精神中，一開始便追求能夠跨越遙遠物質空間的道德紐帶。聖者認為在華夏世界，「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⑪，大地域的文明容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⑫，但同時也更需要強有力的將家庭、社會、國家、天下整合為一的、行之有效的社會倫理系統。在古代社會的上層，追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主張「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在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推動下，形成獨具特色的文治倫理，使每一社會成員無論身居何處，均感覺皇權的存在，而這並不需要皇帝親自出馬。

皇權無所不在，是一統王朝的政治目標之一。全國的行政區劃制度，是在整個王朝地域保證皇權有效存在的重要核心內容。《禹貢》十二義雖然提出了方案，但仍不能說是實際的解決。正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所率領的社會實踐者，具體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會機制、由區域對抗到天下一統的過渡、在多樣的文化區之上成功地覆蓋統一政治體系等關鍵性歷史課題。這一王朝組建過程，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地理過程，在這一方面，中國與其他一些只有歷史、沒有甚麼地域的小國，存在深刻的差異。自此以後，中國強調一統，全國地圖多稱「一統圖」、「混一疆理圖」，全國志書多稱「一統志」。

五 「體國經野」之道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與秦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以偏僻之國奪得

天下，而面對統治遼闊疆域的歷史新課題。兩者在沒有多少前朝實踐經驗的情況下，在設定國土管理制度這一關鍵課題上，各自都做出了重大發明。我們所說的王朝地理的實踐也正是由此開始。所謂王朝地理的實踐，就是在現實社會中建立具體的空間上的權力層次，有效地管理國土、有效的實現王(皇)權。關於這一套作為，《周禮》稱作「體國經野」，屬國家管理的總綱大計之一。《周禮》原話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管理大地域的辦法，西周採用的是封建制，秦國創立的是郡縣制，這是人所共知的兩大基本形態。秦二世而亡，漢興，仍為大地域一統王朝，「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漢極盛矣」^④。漢承秦制，使郡縣制走入成熟。正是由於秦漢郡縣制的成功實踐，使先秦時代便已醞釀的大一統思想得以鞏固和宏揚。

如果說《禹貢》樹立起王朝地理的思想理論形態，那麼《漢書·地理志》則記錄了王朝地理走入實踐的真實情景。翻開《漢志》，可以看到一個現實一統王朝以郡縣為綱的國土構成，或者說是王朝的社會空間結構。它包括全國土地依郡縣級別的分割方式、各行政區域的人口數目、何處何地設有工商衙署、重要地方的歷史沿革、名山大川祠所位置等等。《漢志》是王朝地理學的又一部經典之作，樹立了記錄王朝地理的文本範例，它與《禹貢》相互結合（《漢志》中錄有《禹貢》全文），開闢了古代地理學術主流的先河。後世研究王朝地理的學者都要祖述《禹貢》，上接《漢志》，許多地理文本的編纂也多因襲《漢志》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分割州、府、

郡、縣政區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更不是一勞便可以永逸的事情。它要根據「天時」、「人和」的變動而隨時調整地理，這正是人文地理的能動性、操作性、規劃性的所在，說明地理學絕不是一門僅僅被動記錄地上事物的「認識世界」的學問，也是「改造世界」的利器。在古代王朝策略中，也包含着地理策略，如「推恩」法、「犬牙交錯」等都屬地理手段，用以消翦諸侯勢力、防範地方割據。所以不只是學問家重地理，政治家、策略家也重地理之術，講求熟練的地理上的權力運籌。周振鶴先生曾精辟地歸納了中國古代「體國經野」，也就是地理上權力運籌的幾個重大問題：分封制與郡縣制、二級政區與三級政區、行政區劃幅員的伸縮、犬牙交錯還是山川形便、行政區劃的等第變化、軍管型特殊政區的設立等^⑤。不難看出，上列問題都是朝廷大事，解決好此類問題，遠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做到的。唐朝宰相李吉甫曾親自出馬主持編纂《元和郡縣圖志》，這是一部中古時期重要的王朝地理著作，李吉甫說得明白，從事地理就是為佐「明王」「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用以「紐」天下的綱紀，「制」世上的群生。

關於王朝地理實際操作的成功例子，可以舉西漢諸侯王國封域的變遷。漢初諸侯鼎盛時期，「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⑥。但是到了漢末，通過削藩、推恩等一系列割裂、削奪王國領域的政策實施，諸侯式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只有三四縣。王侯衰微，漢王朝得以鞏固。漢代對大地域政治結構的改革，是漢代社會歷史的重要內容，它的社會波及面亦十分廣泛，乃是不少問題的淵源。此外，在中國

需要指出的是，分割州、府、郡、縣政區要根據「天時」、「人和」的變動而隨時調整，這說明地理學絕不是一門僅僅被動記錄地上事物的「認識世界」的學問，也是「改造世界」的利器。在古代王朝策略中，也包含着地理策略，用以消翦諸侯勢力、防範地方割據。所以不只是學問家重地理，政治家、策略家也重地理之術。

中國的名山大川，幾乎等於王朝的代名，「坐江山」，就是治中國。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江山作為政治符號的時候，是有特別秩序的，所以名山大川的確定，屬於朝政，而並非約定俗成。參觀一下北京地壇的名山祀位展覽，可知清代朝廷所序列的「岳山」與「鎮山」都有哪些，滿人崛起於東北，東北的名山自然不會缺席。

歷史中我們還看到，由於管理大地域的政治需要，在疆域的重要部位，還形成了行政區域劃分的反自然主義即「犬牙交錯」的辦法。顧炎武說河南河北必不以河為界，湖南湖北必不以湖為界，「這種行政區域劃分反自然地理的山水格局界線，加緊山兩側，水兩岸之間的居民聯為一體的行政措施行之有年，的確給動盪時期企圖據險而守裂土自治的軍政集團增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煩」。而「原屬同一政區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經歷養成了山水兩側非要一體不可的習慣。此種民族聚合作用不言自明」^⑦。

六 「國破山河在」

在傳統地理學中，的確包括對山水宏觀格局的系統認識，但在人文地理佔據主導地位的王朝時代，自然山水常常被納入表述王朝疆域的話語。名山大川的宏觀格局被看作是華夏大地的不易骨骼、基本框架，其最高意義是為王朝大局規定永恆分野。比如《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但分畫出來的區域很快成為經典的人文區域。唐代僧一行的天下河山「兩戒」說也是一例，它敘述的是天下河山的布列，而表達出來的卻是傳統的「華夷之限」的觀念。自然地理事物含義的人文化，是王朝地理的又一重要特點。

在王朝疆域中，名山大川的選派定位常有政治考慮，著名的例子有秦始皇重序名山一事。先秦時期已形成「五嶽」、「四瀆」的概念，對於中原國家來說，「五嶽」、「四瀆」的方位分布比較均衡，但對於後來定都於咸陽的秦朝來說，則「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了，這種局面有損於秦朝的正統性。

為了實現「地德」的完美，秦始皇令祠官重序名山大川的名單，增加名山的數目，使咸陽東西各有名山數座^⑧，從而達到方位的均衡。不難看出，這裏所謂均衡，只是相對於帝都咸陽而言，是秦朝人所感到的均衡。這是人文理解，而不是自然現象。

名山的均衡分布，標誌着王朝地域在「普天之下」的和諧性，是天下一統形勢的又一表述方式。在這一方面的用心，尤以五嶽觀念的建立為最。五嶽本是先秦時期形成的一套名山系統，它們之間，彼此呼應，五方相配，形成體系，構成一個超越了本身自然屬性的禮法地理大坐標。它們在維中國、表華夏的崇高性、穩定性上，超越了王朝建立的任何其他區位概念。例如《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表示不是完美之事。西漢武帝時，濟北王獻泰山，常(恆)山王罪遷，「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說明皇權鞏固。五嶽概念的形，是中國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事，而五嶽本身則是王朝文化地理與政治地理的重要內容^⑨。天子祭名山大川，為定制。運用禮儀制度與道德規範對政治進行有力的輔助和補充，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點。兩周以至秦漢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在王朝地理方面，完成了充分的封建制的實踐以及由封建制向郡縣制的深刻轉變，從而解決了對廣闊國土進行一統性政治建設的艱巨的歷史課題。五嶽從概念到事實的確立，是這一政治地理過程的重要側面，它一方面以禮儀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對遼闊國土的一統性的建設，另一方面則向自然景觀灌注了濃厚的禮法政治含義，使其成為獨特的描述華夏文明的王朝地理語言。

「國破山河在」，王朝亂了，山河依舊，以山河為口號，向來可以振奮華夏子弟的復興決心。中國的名山大川，幾乎等於王朝的代名，「坐江山」就是治中國。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江山作為政治符號的時候，是有特別秩序的，這些秩序在王朝地理的文獻中有許多規定和討論。「五嶽」、「四瀆」、「四區」、「五藏」、「九鎮」、「山河兩戒」、「四列」、「五色土」等等，都是古代討論過的山河土地秩序，在王朝意識形態中，它們都曾受人尊崇的地位。如果亂了山河秩序，就等於亂了天下，亂了朝綱，所以名山大川的確定，屬於朝政，而並非約定俗成。參觀一下北京地壇的名山祀位展覽，可知清代朝廷所序列的「岳山」與「鎮山」都有哪些，滿人崛起於東北，東北的名山自然不會缺席。清人建都北京，地處傳統中原大地的東北部，於是有人將天下山水的總方向朝京師靠攏，以歌頌帝都的崇高偉大：「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⑳

歸納本文，「地」的問題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角度之一。自《春秋》作，便重視地的問題，所謂「《春秋》重地也」^㉑。《史記》所開闢的王朝歷史之學，從一開始，視野便緊隨文明的空間步伐，西至空桐之山，北過涿鹿之野，南浮江淮，東漸於海，上會稽，探禹穴，涉大漠，登龍堆，在大空間之內，觀社會發展，察人文現象。常言道：「史地不分家」。《四庫》分類，將「地理」放在「史」部。的確，探索中國王朝社會的問題，不可脫離對王朝地理的研究。王朝地理，是歷史過程，也是思想體系。

註釋

- ①② 《淮南子·墜形訓》。
- ③ 《尚書·呂刑》。
- ④ 章太炎：〈中國文化的根源與近代學術的發展〉，《章太炎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頁11。
- ⑤ 楊向奎口述，李尚英整理：《楊向奎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3。
- ⑥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 ⑦ 《左傳·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 ⑧ 見《禹貢錐指略例》。
- ⑨ 《舊唐書·賈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786。
- ⑩ 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 ⑪ 于敏中：《日下舊聞考·表文》（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頁11。
- ⑫ 《孟子·公孫丑上》引孔子語。
- ⑬ 《易·大傳》。
- ⑭ 《漢書·地理志》。
- ⑮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 ⑯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802。
- ⑰ 李寶臣：〈禮法社會的政治秩序〉，《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頁56。
- ⑱ 事見《史記·封禪書》。
- ⑲ 參見唐曉峰：〈五嶽地理說〉，載《九州》，第一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
- ⑳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一形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7。
- ㉑ 《左傳》、《公羊》語。

唐曉峰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從王朝地理到歷史地理》（英文），及歷史地理研究論文多篇。